

辛亥革命与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廖大伟

【提 要】 辛亥革命给上海带来的进步是全方位的且难以估价，其中，推动了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促进了上海城市发展。辛亥革命为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宝贵的契机和有利的条件，蓄势而发的上海则以对辛亥革命的实际贡献和巨大作用确保了自身政治地位的提升。辛亥革命与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一种互动互助、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彰显的过程。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上海 政治地位

所谓近代城市政治地位，主要指发展中城市的两大动态指标要素，一是行政级别，一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演角色的等级，抽象地说，即该城市的威望度和认同度、吸引力和辐射力、创新力和整合力。城市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综合概念。中国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政治地位的提升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象征和内涵。一般而言，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城市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城市社会、文化、制度的进步，而城市政治地位的提升也会促进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文化、制度的良性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助互动、互为因果的关系，尽管有时表现的并不明显，但这种关系客观存在。辛亥革命时期是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上海不仅是一个经济上海也是一个政治上海的良好开端。本文所要论述的是辛亥革命与上海这个大题目中一个子问题。今天的上海是昨天的继续，现在上海具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正是当年的承延和发展。然而，辛亥革命与上海政治地位提升的研究迄今还是空白，^①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对辛亥革命与上海关系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上海城市发展路径的探寻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辛亥革命为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上海原以商贸金融工业发达而闻名，论政治地位和作用，上海原本并不显著。长期以来城市政治地位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城市政治功能与城市经济功能不相对称，难以适应，此种格局阻碍上海城市整体快速发展。租界及太平天国运动曾经刺激和带动了上海城市发

^①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总论之三“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阶段和关节点”，曾提及并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在中国政治上

展，它们分别带来了先进的器物、制度和理念，带来了城市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劳力和消费，但是政治地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并未明显改变。19 世纪末，上海已是百万人口城市，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已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① 然而上海依旧隶属于江苏省，仅仅是江苏省松江府和苏松太道管辖下的一个县，行政级别既不能与南京相比，也不能与苏州相比，甚至还比不上松江，仅比同级的青浦、宝山等县多了一个苏松太道衙门而已。

跨入 20 世纪，上海于全国政坛渐有气势，政治地位开始呈上升趋势，政治影响力在缓慢稳步地增长。这一现象固然映显了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外事功能不断增强的后劲，但更要归功于那些依托“一市三治”特殊格局进行舆论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激进分子与革命党人。众所周知，1900 年至 1911 年期间，上海连续演绎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政治剧，比如爱国学社、张园国会、苏报案、民立报还有同盟会中部总会等等，这些剧目均具有全国影响和重大历史意义，因此无意中为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夯实地基的作用，反之也证明了上海在 20 世纪初的全国政坛上已渐有影响，初居一席之地。但是尽管如此，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上海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只是缓慢地增长，政治待遇依旧没有较大的改善，政治地位依旧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具体地说，行政级别没变，政治影响力、辐射力增长了，但政治吸引力、认同度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

明显改变这一状况的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为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大气磅礴、急风暴雨般的辛亥革命，为上海在全国政坛上显著脱颖提供了可能，为上海政治地位迅速腾飞创造了十分宝贵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造成了皇权专制的崩溃，挑战并冲击了旧的等级、旧的秩序、旧的束缚、旧的观念，从而激发起上海人进一步关心政局、介入政治的意识，增强了上海以独立姿态参与全国政务的信心和勇气。

辛亥革命的反清目标把倾向共和的地方市绅与革命党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团结合作无疑壮大了上海政治力量的阵容，提高了上海政治威望，加重了上海在全国政界的份量，也为上海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当时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有政治声望、有全国影响、有经济实力的市绅名流，如赵凤昌、熊希龄、伍廷芳、李平书、沈缙云等等，他们态度转变，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大大提升了上海在当时政治风云中的影响力、竞争力，自然而然地使其他地区对上海刮目相看，而这些对于上海参与政治角逐、进军全国政坛无疑至关重要。

的地位”，但此论点没有展开加以论证。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19 世纪末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90 页。

辛亥革命为上海共和革命派公开亮相，尽情表演，充分施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当时上海政治力量的代表或主体为共和革命派，他们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革命党人，包括同盟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成员，一是倾向共和革命的上海市绅，其中有资本家、商人、寓公，还有地方自治团体领袖。辛亥革命前夕，一大批政治精英活跃或潜伏在这个“一市三治”的区域里，原先革命党人的活动是秘密的，而那些倾向或正在开始转向共和革命的地方市绅则心照不宣。辛亥革命不仅促成了原有革命党人与这些地方市绅的联合，为他们公开亮相共同打拚提供了时机和舞台，而且吸引了更多的精英名流汇聚于此。上海共和革命派汗畅淋漓的施展和表演完全托福于辛亥革命，而它的显著结果则是上海威望度和认同度的提高，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增强，创新力和整合力得到锻炼。

在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大界标和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它曾给上海城市带来了全方位发展的契机和巨大的驱动力，曾给上海人带来了空前的信心和希望，对上海城市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上海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实际贡献和巨大作用确保了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是主观与客观的最佳结合，是上海政治力量非常珍惜和很好地把握了机遇的结果。

辛亥革命为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但是要将可能变为事实，还有待于上海本身，取决于内部因素。如果当时上海不珍惜或没把握好这宝贵的机遇，结果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任何重大印迹不会留下。事实表明，上海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色，贡献独多，作用巨大，上海共和革命派以实际行动很好地把握了这次机遇，从而确保了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

上海光复是同盟会与光复会长期努力的结果，是他们着眼大局、携手合作、精心策划、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倾向共和的地方市绅与革命党人团结合作的结果，是上海革命党人联络争取上海各界共同革命的结果。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上海支部加快步伐，积极筹划，准备起义响应。不料，武汉战局骤然恶化，新军第九镇南京起义又告搁浅，显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① 危急之际，上海革命党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决定改变原定方案，变“追随江浙”为“上海先动”，^② 于是提前至1911年11月3日

^① 《沈缙云先生年谱》附言：李平书撰《哀文》。

^②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72页。

上午发动起义，次日旋得光复。此时，相距武昌起义仅 35 天。

此间虽已有多省宣告独立，然上海光复的意义实在非凡。作为中外闻名的通商巨埠，上海光复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地域的界限。一方面它及时减轻了起义各省尤其是首义之区武昌、汉阳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带动了江浙，策动了东南，推动了全国，引起了江浙两省的连锁反应，有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此外，它还使列强对清廷愈加失去信心，使之断言“清政府在东南之命运已绝”。^① 孙中山曾高度评价上海光复的伟大意义，他说：“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②

上海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和贡献还远远不止于此，比如，南京光复有上海军队直接参加，攻打南京得到上海军火的大力接济；比如，先遣北伐上海出兵数千人，并出动 3 艘军舰；比如，各地过往军队无不获益上海的援助，“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师，皆取道申江，纷纷供应，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应，莫不于沪军是问”；^①再比如，上海媒体一直高唱革命主旋律，坚持民主共和的舆论导向，由于上海的媒体受众面广信誉度高，上海媒体的舆论导向对革命时势和政局走势起了积极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没有辜负革命所带来的客观机遇和条件，上海出人、出械、出资、出舆论、出政见，通过自身努力，通过自身对辛亥革命的巨大作用和实际贡献，实现了自身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

三 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具体表现何在？主要如下：

一、光复后即告成立的沪军都督府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上海地方政权，这个政权虽然存在不足 9 个月，但它却以前所未有的独立姿态开创了上海与各省平等共事的先河，向全国展现了上海政治智慧、才干和风范，当然也为上海争得了荣誉和地位，为以后上海由县变市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沪军都督府实际上是上海建市的预演和尝试，是以后上海市政府行政建制、公共管理的原始模式和最早雏型，因此它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

^① 《本馆欧洲紧要专电》，《民立报》1911 年 11 月 5 日。

^② 孙中山：《有志竟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44 页。

不可低估。

二、辛亥革命时期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活动最初是在上海起步，资产阶级共和国最早是在上海酝酿，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最先是在上海成立。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后的第二天，倾向君主立宪的赵凤昌、雷奋、杨廷栋等就相聚惜阴堂筹商拥袁组阁的办法，此时他们既不要清政府，也不要革命党，认为实力雄厚的袁世凯最适宜当权。11月中旬，开始接受共和思想的这批人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组织全国会议团”的建议，希望各省选派代表常驻上海公议大事，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深表赞同，也发出邀请。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当天就有10省代表报到与会。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来迁到武汉，不久又迁南京，期间制订、审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从无序变为有序，从分乱趋向统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功不可没”。^② 而它最初成立于上海，这表明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表明此时上海的政治已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三、辛亥议和起于武汉，终于上海，武汉和谈只是双方初步的接洽，意向的磨合，上海议和是武汉和谈的继续和深入，是双方公认的全面正式的谈判，它所决定的是清王朝命运，袁世凯未来，同时也直接关系到辛亥革命的成与败。辛亥议和不仅移址上海，并且在上海最终完成，上海共和革命派直接引导了关键的谈判，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一个南北统一的共和国在上海和谈中诞生。辛亥议和移址上海绝非偶然，它是汉沪两地抗衡争霸的结果，是上海争而胜之的象征，更是上海政治地位疾速腾飞的标志。

四、民国初年党团林立，政党政治骤然繁荣，这一现象最初出之上海。自上海光复至1917年7月，先后成立或主要活动于上海的政党政团至少有56个，^③这一蓬勃景观，只有后来的北京可比，北京是得国都之利，而且“上海政党之出现先于北京，北京之党派大多脱胎于上海之政党”。^④显然，上海是民初政党政治的发源地，是众多资产阶级政党团体初生的摇篮，并一度是资产阶级组党参政的中心，这表明上海光复后政治地位急剧上升，民初的上

^①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② 廖大伟：《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述论》，《史林》199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8年第11期。

^③ 廖大伟：《民初上海“政党”》，《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④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9页。

海始终是全国政坛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同时也表明此时上海具有极大的政治吸引力，上海在全国的政治认同度得到极大提升。

此间上海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发生固然可以归之于我们前面已经阐述的诸多原因，但我们还应注意一个动态的因素所带来的连续结果。当时汉阳失守，武昌窘迫，南京光复，东南底定，不少有望进入临时中央政府之人滞留上海，而上海本身又汇聚了一大批精英名流。这就是说，上海政治地位与本方阵营之间各地政治地位的消长也有密切关联。这样的局势变化为上海扩大政治影响、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绝好的良机，无数风云人物的云集又为上海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飙升提供了空间。在革命中心由武汉向南京转移过程中，与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一时扮演了头号角色，于全国政坛举足轻重。

四 辛亥革命所以能够推动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原因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动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除了上述客体提供的可能和主体主观能动外，还有一些主体客观的具体原因。

一、已有的呈上升趋势的政治地位不可忽视。如上所述，20世纪初，上海的政治地位已经开始呈上升趋势，政治影响力在缓慢稳步地增长。这一现象既体现了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外事功能不断增强的后劲，更归功于激进分子和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及政治活动。那时起，资产阶级嬗递代谢的各政治流派均将上海作为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凡重大思潮和政治运动多从这里起步而辐射于全国。当然这些思潮和运动都是反政府的体制外的，它的传播形式和管道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但是它为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上海固有的不同其他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值得重视。当时就有人说：“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①确实如此。上海地处东南，襟江濒海，近代以来一直是联系南北、交通中外的枢纽；上海交通迅捷，联络便利，设施先进，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新闻和思想的辐射源；上海有全国最大的租界，租界的特殊性使得上海及在上海发生的一切也变得特殊，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与之不无相关；上海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工商阶层实力雄厚，而上海又是西方文明输入的窗口，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沿基地，所以上海人民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始终比较强烈。

三、一大批精英聚集在此尤其关键。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已有一批政治精英潜伏或活跃

^① 《程德全、汤寿潜致陈其美电》，《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

在这个“一市三治”的特殊区域里，上海光复后则有更多的精英名流汇聚于此，其中既有同盟中枢人物如陈其美、宋教仁以及后来的黄兴，也包括江浙名流和沪上寓公张謇、汤寿潜、赵凤昌、伍廷芳以及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龄等。这批人受势与利的驱动而结盟，能量愈加发挥，虽然这个圈子时常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但对外基本还是一致，由是将在此上演的一幕幕政治剧唱得有声有色，唱得全国为之侧目，唱得自身影响和地位空前升腾。由于同盟会主要人物的聚集以及原江浙立宪派人的合作，上海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政治影响力开始日益显彰。两者合作所形成的巨大实力，赢得了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和威望，左右了当时革命阵营的发展趋向，因此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最先在这里成立，辛亥议和最终移址上海，甚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些重大政治决策仍在这里产生也就毫不奇怪。

四、天时地利。汉阳失守，已使武昌十分窘迫，南京光复，东南底定，更使武昌地位大跌，失尽威望。相反，战局的变化却使上海获得主动，得益非浅。当时临时政府虽已设定南京，但许多准备还不就绪，有望进入临时政府的那些人仍滞留上海，他们打算待基本成熟之后才一同赴宁。这样，与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就一时就成了革命的大本营，上海也因这批人的存在而地位和威望急剧飙升，在革命中心由武汉向南京的过渡中上海扮演了最显要的角色。^①

五 辛亥革命推动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重大意义

辛亥革命推动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不仅对辛亥革命产生积极有益的回应，而且对上海城市发展，东南社会的发展，上海的国际形象，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首先，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推动了辛亥革命开展和深入，加速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进程。上海光复后，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活动在上海起步，资产阶级共和国最早在上海酝酿，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率先在上海成立，还有辛亥革命议和，政党政治新景观等等，这些无一不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民主的动力，有利于政治进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正是因为上海政治的地位有了提升，上海才能为辛亥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有大的作用，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民主化、现代化服务。

其次，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对上海城市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光复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先声，一个雏型，是上海由县变市的

^① 廖大伟、高红霞：《辛亥议和地点的变动及其原因》，《史林》2000年第3期。

最初实践和尝试。沪军都督府虽然在 1912 年 7 月宣布取消，但它为上海建市的努力没有白搭。不隔一年，北京政府以上海为国内重镇要地，决定设上海镇守使加强控制管理。1915 年底，北京政府又将上海、松江两镇守使统并升级为松沪护军使，实际上将上海提到仅次于行省的级别。1926 年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成立，闸北、沪南、浦东、沪西、吴淞五区行政初步统一。督办公署类似于一个市政府，它为以后上海建市奠定的地域基础和提供了管理上的便利。1927 年 7 月上海特别市成立，此为上海由县治改建市制的发端，也是上海直隶中央不再属于江苏省行政范围的开始。3 年后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基本行政建制一直至今。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上海不仅是一个经济上海也是一个政治上海的良好开端。今天的上海离不开过去，今天上海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正是当年的延续和发展，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不仅为今后上海行政建制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为今后上海经济、文化、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再次，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改变了国内政治格局，提高了东南社会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江浙政界、工商金融界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上海的国际地位。上海的稳定和政治地位提升，吸引了更多国人关心政治，热心公益，同时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良好形象，不仅有利于当时稳定列强，避免干涉，而且有利于今后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总之，辛亥革命与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互相促进的关系。发生在上海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现象无疑是上海政治地位提升的象征和结果，反过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政治现象也为上海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提供了促进作用。

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地给一切好的坏的、合理的不合理的都提供了表演施展的机会，但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好的合理的留下了，发达了，坏的不合理的淘汰了，湮没了，正所谓“大浪淘沙”，所以尽管这样动荡要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动荡还是必要的，推陈出新总比死气沉沉好。